

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文物与考古论集



26.3003

122

2

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文物与考古论集

文物出版社编辑部 编

文物出版社

—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TREATISES O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Compil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7

封面设计： 阚文青

文物与考古论集
文物出版社编辑部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23.5

统一书号：11068·1577 定价：4.30元

目 录

- 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 贾兰坡 黄慰文 卫 奇 (1)
-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 (17)
- 谈“晋文化”考古……………苏秉琦 (44)
- 陕南甘东的先仰韶文化…………… 林学晋 游学华 (55)
- 横阵墓地试析……………严文明 (66)
- 丰下遗址陶器分期再认识……………郭大顺 (78)
- 先夏文化探索……………田昌五 (93)
- 陶寺遗址的发现和夏文化的探索……………张长寿 (110)
- 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邹 衡 (114)
- 彝族和纳西族的羊卜骨
——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汪宁生 (137)
- 关于西周春秋高级贵族礼器制度的一些看法…………… 王世民 (158)
- 两广先秦文化……………黄展岳 (167)
- 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张忠培 (177)
- 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具体途径…………… 林甘泉 (186)
- 书画鉴定三议…………… 启 功 (212)
- 东晋、南朝拼镶砖画的源流及演变……………杨 泓 (217)
- 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陶术……………俞伟超 (228)
- 论石楔及石扁铲——新石器时代考古中被误解了的

重要工具·····	杨鸿勋 (239)
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	张光直 (252)
长江流域早期甬钟的形态学分析·····	殷玮璋 曹淑琴 (261)
它簋新释——关于西周商业的又一例证·····	李学勤 (271)
新出汉匈奴语官号印辨正·····	黄盛璋 (276)
两汉五铢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吴荣曾 (286)
我国古代的革带·····	孙 机 (297)
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	傅熹年 (322)
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建筑构图分析·····	陈明达 (344)
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	徐莘芳 (357)
 编后语·····	 (370)

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

贾兰坡 黄慰文 卫奇

中国的旧石器考古，自1920年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层中发现第一批有记录的旧石器材料以来，至今已经历六十五个春秋了。前二十九年，从事这门学科的人们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取得了不寻常的成绩。北京人及其文化、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水洞沟文化、山顶洞人及其文化等发现，不仅消除了人们头脑里对中国是否存在比四千年文明更早的历史的疑问，而且确立了中国在旧石器考古方面的国际地位。后三十六年，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期，旧石器考古进入真正的黄金时代。无论是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培养，还是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的范围、规模和深度，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今天，已经获得的化石材料可以代表人类进化各个主要阶段，已经获得的文化材料可以建立起初步完整的发展序列了。幅员广大的国土，发育和出露良好的第四纪地层，丰富的化石和文化遗物蕴藏，加上政府对这门学科的一贯重视和支持，使中国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上研究早期人类进化及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一 重大的发现和进展

(一) 早更新世人类化石、文化遗物的发现

直到五十年代，一般人仍认为中更新世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在中国，北京人及其文化就是这个开端的代表。然而，对北京人文化深入研究之后，在中国可能存在比北京人时代更早的人类和文化的推论提出来了^①。当时，学术界对这种推论看法不一。围绕“北京人是不是最早的人？北京人文化是不是最原始的文化？”的争论，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持续多年而未能平息。今天，虽然还有研究者对于中国存在比北京人时代早的人类和文化持怀疑态度；但是，就多数人来讲，这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因为，早更新世地层中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在华北、华南已不止一处出现。

1. 西侯度文化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黄河左岸高出河面170米的古老阶地上。1959年发现，1961和1962年发掘。从交错砂层相夹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三十二件石制品、一些烧骨和带

切刮痕迹的鹿角。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保存完好，计有巨河狸、剑齿象、双叉麋鹿、披毛犀、古板齿犀、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等二十二种，它们均为绝灭种。根据动物群性质，遗址属早更新世。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80万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②。

西侯度的石制品多用石英岩砾石制成，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打片采用锤击、砸击和碰砧三种方法。标本中的小型漏斗状石核和有棱脊台面的石片代表一定的技术水平。石器主要用石片加工。刮削器分为凹刃、直刃和圆刃等种。砍斫器也有单面和两面加工两种，前者居多。三棱大尖状器只发现一件，而且是脱层的，但考虑到附近未见另外的文化层，所以推断它与其他石制品同出一层。这种很有特色的工具也见于丁村、匭河、蓝田等时代较晚的遗址。西侯度的烧骨的色泽和其他特征与北京人遗址的无异，化验结果也表明是烧骨。带切刮痕迹的鹿角上的人工痕迹清晰，可能是当时人们制作骨器的遗物。它们的存在给西侯度作为早期人类遗址增加了证据。

西侯度遗址和东非奥杜威遗址的“东非人”化石和同层的“奥杜威文化”于同年发现。经钾氩法和古地磁法测定，这种远古文化的年代距今175万年，是世界上公认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西侯度文化在时代上与之大体同时，但在发现和研究初期，国内同行对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多有怀疑，其中有的本来就不相信地球上会有比北京人更早的人类和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西侯度的发现在整整二十年之后才正式公诸于世。尽管类似遭遇在科学史上不是孤例，但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插曲时，遗憾之情仍难以排解。

2. 元谋人及其文化

云南省滇中高原上的元谋盆地，新生代沉积发达，哺乳动物化石丰富，是和华北泥河湾盆地齐名的早更新世标准剖面所在地。1965年这里发现两颗人类上内侧门齿化石，随后几年发掘又获得许多动物化石和一些文化遗物。人类化石研究后命名为“元谋直立人”^③，俗称“元谋人”，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和一些可能是人工用火留下的炭屑。石制品只发现了十七件，包括四件刮削器、一件尖状器以及一些石片和石核。它们以石英和石英岩砾石、石块为原料，打片、加工用锤击法，标本尺寸偏小^④。对说清楚石器工业的性质来说，现有材料尚嫌不够。而堆积中出现的炭屑是否属人类用火遗迹，也因这里作为当时人类生活面的地层还不大清楚而有待进一步工作。

含元谋人化石和石器的地层为一套巨厚的河湖沉积的上部，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最后枝角鹿和山西轴鹿等二十九种，其中绝种动物占94.4%。动物群的性质表明遗址属早更新世^⑤。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70万年左右^⑥。

不久前地质界有研究者以“元谋盆地强烈的新构造活动，特别是明显断裂活动使地层关系复杂化”为理由，重新解释古地磁测定结果，认为元谋人层位的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而可能是距今50—60万年或甚至更晚一些^①。这一见解自然地引起各界的关心。1984年2月，本文后两作者等曾去元谋盆地考察并获得初步印象：产元谋人化石和石器的元谋组是一套连续沉积的河湖相堆积，与不整合地覆盖在它上面的中更新世冲积、洪积物明显有别；新构造运动确实使元谋组地层发生倾斜和一些错断，但看来还不致于使地层程序产生混乱。另外，新见解提出的元谋人年代——与北京人年代相当，很难同元谋人化石和元谋动物群的古老性质协调。所以，在取得足够的新证据之前，我们倾向于维持元谋人生存于早更新世的主张。最近，原研究者之一到元谋重新采集古地磁样品，测定结果仍然是距今170万年^②。

3. 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

小长梁和东谷坨均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分别于1978年和1981年发现。小长梁出土的石制品有数十件。而东谷坨的材料多得多，两次发掘所得的石制品超过一万件。上述材料已陆续公布^③。由于两地相距仅1公里多，产石器的层位大致相同，石器工业的性质一致，所以很可能是同一遗址的两个部分。

这两个石器地点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很大兴趣。因为：第一，石器出自向来被认为属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的河湖相地层中，文化层经古地磁测定为距今一百万年左右^④，大致相当于早更新世末期；第二，石器制作技术相当进步、石器类型相当复杂并清楚地显出与北京人石器之间有渊源关系。

小长梁、东谷坨石器主要用流纹质火山碎屑岩、燧石和石髓等优质原料制成。打片用锤击、砸击两种方法，锤击为主。石核利用率较高，石片尺寸较小，有小的长石片。特别有意思的是，出现了修理台面的石片。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表明已经出现先进的打片技术。石器有多种式样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钻具，还可能有雕刻器，类型相当复杂。对石器用锤击加工，石器刃缘一般呈锯齿状，但同时也出现个别平齐的。另外，东谷坨出土的大量破碎动物骨头中，有一些带有明显的人工修理痕迹。学术界对这两个地点的时代看法不同。已故裴文中教授在小长梁石器发现后认为，这批材料技术上“已经达到了黄土时期的式样，当中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他怀疑小长梁石器在时代上是否属于泥河湾期^⑤。但是，贾兰坡则认为还不能排除属于泥河湾期的可能，虽然他也承认小长梁石器在技术上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⑥。除了石器本身的原因以外，动物化石未能提供明确的证据也是引起对时代争论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两个地点出土的动物化石计有鬣狗、狼、古菱齿象、三门马、三趾马、披毛犀、羚羊、野牛等。它们既生存于早更新世，也生存于中更新世，有些种类甚至一直延续至晚更新世和全新世。不过，石制品的埋藏层位和系统的古地磁测定结果则支持遗址的时代属于早更新世末期的判断。至于石

器是否超越周口店期，看来不致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两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中的进步技术和类型，都可以在北京人石器中找到。

（二）北京人遗址的深入研究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同期的早期人类遗址中材料比较全面和丰富的，研究水平也比较高，因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个遗址的发掘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迫中断。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恢复发掘，另一方面在深入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后者主要有两点：一是系统整理北京人石器和探讨其性质，二是开展对遗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北京人遗址历年出土的各种石制品材料在十万件以上，但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未作系统整理，研究者对这个石器工业性质的看法分歧很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猿人的石器，从全面来看，它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质的。我们从打击石片来看，中国猿人至少能运用三种方法，即‘摔击法’（或碰砧法）、砸击法和直接打击法。从第二步加工来看，中国猿人的石器已相当的分化，即锤状器、砍伐器、盘状器、尖状器和刮削器。这种打击石片的多样性和石器在用途上的较繁的分工，无疑是标志着中国猿人的石器已有一定的进步性质……与中国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还应有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④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可以有几种‘类型’，如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石砧等，实际上都是适合上述人类使用石器的最基本要求（即尖、刃、重）的工具……至于说中国泥河湾（即更新世初期）有人类或有石器，我们应该直率地说，至今还没有发现……（在西方）也有许多人尽了很大的努力寻找泥河湾（欧洲的维拉方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但没有成功。”^④“中国猿人所制作的石器和石片都没有一定的形状。这表明中国猿人打石片和修理石器尚未形成确定的方式方法……在中国猿人石器中，有个别石片或石器修理得比较精致，甚至个别石片可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作比较……但是却是上下地层均未曾见到的孤例……由于制石器尚未形成一定的方式方法，使得刃角和尖角缺乏相对的稳定性，以致出现好象是超时代的器形，例如‘圆头刮削器’、‘雕刻器’、‘鸟喙形尖状器’和‘镞形器’。正是这些在中国猿人石片和石器上表现出来的波动性，致使我们难于相信，它是中国猿人石器的进步事例。”^⑤

1961年，在裴文中、贾兰坡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旧石器组的同志们开始对历年采集的北京人石制品进行分层整理、分类和观察。工作进行到1964年，由于裴、贾两人的意见不一致而未能继续下去。1975年冬，又由裴文中、张森水负责继续完成报告的编写工作。今天，这个对北京人石器的系统、详细的总结已经问世^⑥。它标志着对北京人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争论的一些关键问题，通过这次系统整理已经达到一致或基本一致的认识。例如，关于打片方法，报告也认为北京人曾用过砸击、锤击和碰砧三种方法，认为“有一

些石片形态比较规整”，后期有几件长石片“可与石叶媲美”，并认为形态规整的石片在地层分布上“有渐增的趋势”。关于石器类型，报告也认为“在类型上有一定的分化，现在所划分的各类工具的形态界线基本是清楚的”、“类型的可分性是主要的，不可分性只是次要的”。认为北京人文化上的进步也“清楚地反映在石器的制造中，从中还可以看到其进步速度有加快的趋势。”

对北京人遗址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始于1977年年底，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个科研、教育和生产部门的研究和工作机构参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工作内容包括对周口店地区北京人和伴生动物、晚新生代地层、岩溶洞穴发育规律、孢粉、古土壤、沉积环境、古气候、年代学等方面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遗址所在地进行详细的地形测绘；拍摄北京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资料片。上述工作已经进行总结和发表^⑦。其中，对遗址的年代测定十分惹人注意。

过去，主要根据动物化石将遗址的时代订为中更新世。北京人动物群材料充实（哺乳动物近百种），研究也比较深入，所以上述结论有可靠的基础，数十年来还未见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然而，按目前比较通用的年表，中更新世从距今100万至10万年，所占时间长达90万年。那末，由遗址中大约40米厚堆积物所代表的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是占中更新世的全部还是一部呢？如果是一部，又是中更新的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呢？另外，从年代学的角度说，用地层古生物学方法得出的中更新世是“相对年代”，与指出具体年龄的“绝对年代”不同。而后者要靠同位素年代学等方法取得。因此，对北京人遗址堆积层的年代测定成为深入研究这个遗址的各个课题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目前，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满意的答案。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热释光法、氨基酸外消旋反应法和古地磁法测定的结果，遗址的底部堆积（第13层）形成于70万年前，顶部堆积（第1—3层）形成于20万年前左右。换句话说，从距今70万至20万年前左右的大约50万年，是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生活的年代。这个测定结果，使北京人的年代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从而避免过去出版物中的种种不全面的说法，如50万年、40—50万年、30万年、10多万年，等等。

（三）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

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只有由北京人及其文化、河套人及其文化、山顶洞人及其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序列。对于一个幅员广大、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这个“三部曲”未免过于单薄了。今天，情况已经大为改观。除了前面述及的早更新世人类和文化外，按照地层单位，中更新统（世）可以细分为“公王岭组”、“周口店组”和“许家窑组”；上更新统（即晚更新世）可以细分为“丁村组”、“萨拉乌苏组”、“峙峪组”、“下川组”和“山顶洞组”^⑧。这个序列是建立在三十多年来华北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基础之上的。

公王岭在陕西省蓝田县。1963年在这里的红色土地层中发现一些动物化石。1964年正式发掘,在获得大量动物化石的同时,发现了一个人类头盖骨、一块连有第二和第三臼齿的上颌骨和一枚单个上第二臼齿。头盖骨眉嵴非常粗大、额骨很低平、骨壁极厚。它的脑量为780毫升,比爪哇人(五个头骨平均脑量881毫升)和北京人(五个成年头骨平均脑量1088毫升)都小。以上表明,蓝田人比北京人、爪哇人原始,是迄今已知亚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公王岭动物群含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獭、中国獭等好几种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是一个带有浓厚南方色彩的动物群。它在时代上代表中更新世早期,周口店动物群代表中期和晚期。古地磁测定公王岭的化石层的时代距今100万年左右。最近,有研究者根据化石层与黄土、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对比,主张将公王岭组归入早更新世晚期^⑩。

和蓝田人大体同时的是匭河文化。遗址在山西省芮城县,1957年发现,1959年起至1980年作了五次发掘。从红色土下面的砂砾层发现大批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1960年以前的材料已发表^⑪。动物化石除了肿骨鹿、德氏水牛等中更新世典型种类外,还有师氏剑齿象、三趾马等残留的第三纪种类。

周口店组以北京人遗址为代表。前面已提到,北京人遗址大约40米厚的堆积的时间跨度从距今70万至20万年左右,实际上包含了中更新世的中期和晚期一部分。相当于北京人早期的人类化石,还有1963年在蓝田陈家窝子村附近红色土地层中发现的直立人下颌骨。它在形态上与北京人的基本一致,古地磁测定为距今65万或50万年。

许家窑遗址在山西省阳高县和河北省阳原县,1973年发现,随后作了多次发掘,从河湖相堆积中发现了丰富的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⑫。动物化石有许多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成份,但又出现裴氏扭角羊、葛氏斑鹿和似布氏田鼠等周口店动物群的成员,加上许家窑人本身具有不少类似北京人的原始性状,所以考虑将其时代划为中更新世晚期。铀系法测定含化石的地层形成于距今12.5万至10万年^⑬。

1978年在陕西省大荔县发现的大荔遗址,时代也属中更新世晚期,比许家窑遗址还稍早些。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埋藏在河流的第三阶地砂砾层中,距地面30多米。动物化石中出现肿骨鹿这样的典型的中更新世动物化石,铀系法测定遗址的年代为距今23万至18万年^⑭。大荔人化石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不足三十岁的男性的头骨。它既具有头顶低矮、前额扁平、眉嵴粗壮程度比北京人更甚、头骨骨壁厚度接近北京人等的原始性状,又具有吻部不很向前突出、颧骨细弱、颅骨最宽处在颧骨鳞部的后上部、颧骨鳞部呈圆鳞形等智人的进步性状。另外,它的脑量估计为1120毫升,稍大于北京人脑量的平均值。总的看来,大荔人的体质形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是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⑮。

丁村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个大规模旧石器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

1953年发现，次年发掘，1958年发表报告^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来自沿汾河左岸9公里范围内的十一处石器地点和三处化石地点，层位均为第三阶地砂砾层。动物群含较多的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成份，如野驴、普氏野马、加拿大马鹿、河套大角鹿和原始牛；也有梅氏犀、葛氏斑鹿等周口店动物群成员。原报告将遗址的时代订为晚更新世早期，有的研究者则主张归入中更新世晚期^⑥。铀系法测定为距今21万至16万年^⑦，但氨基酸外消旋反应法测定只有7万年^⑧。

萨拉乌苏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地理上属鄂尔多斯高原南缘。1922—1923年，在这里的晚更新世河湖相地层中发现了一枚幼童门齿化石、二百多件石制品和大量动物化石。人牙研究后称“鄂尔多斯牙齿”，后来在中文里通称“河套人”，代表一种介于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早期人类。动物化石有诺氏象、野驴、普氏野马、披毛犀、普氏羚羊、河套大角鹿、加拿大马鹿、原始牛、王氏水牛、诺氏驼，等等，成份上与周口店动物群显著不同。自二十年代以来，萨拉乌苏动物群一直作为华北黄土期，即晚更新世的标准动物群^⑨。五十年代以来，对这个遗址的工作有很大的进展。首先，人类化石和石制品大大增加。其中人类化石增加了二十多件，包括顶骨、枕骨、额骨、下颌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胫骨等。这些材料中有六件直接出自原生层位。研究结果确定河套人属晚期智人。其次，进行了年代测定。铀系法结果为距今5万至3.7万年^⑩，¹⁴C测定为距今3.5万年（未正式公布）。根据上述人类化石研究和年代测定成果，可将萨拉乌苏组进一步确定为晚更新世中期。

和萨拉乌苏遗址大体同时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水洞沟遗址。它也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缘，与萨拉乌苏遗址同年发掘。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出自黄土下的砂砾层。化石少而破碎，但石制品非常丰富，1923年就发掘到三百多公斤。石器工业具有许多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的特点^⑪，六十年代以来，对文化性质作进一步分析后确定为旧石器晚期^⑫。铀系法测定为距今4万至3.2万年^⑬，热释光测定为距今4万年左右^⑭，¹⁴C测定则只有2.7万年（未正式公布）。综观各项测定结果，水洞沟遗址的年代稍晚于萨拉乌苏遗址。

峙峪组的典型地点在山西省朔县，1963年发现和发掘^⑮。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出自河流第二阶地的砂砾层中。动物化石属萨拉乌苏动物群，年代比萨拉乌苏遗址稍晚，¹⁴C测定为距今2.8万年左右，可以作为晚更新世晚期的一个代表。

晚更新世末期以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为代表。1930年发现，1933—1934年发掘^⑯。与人类化石共生的动物化石有三十三种可以鉴定到种一级的，其中绝灭的四个，占12.1%；其余为现生种。¹⁴C测定，上部堆积距今 $10,470 \pm 360$ 年，下部堆积距今 $18,340 \pm 410$ 年^⑰。处于同一阶段的还有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南海遗址等。

（四）华北以外地区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发现

1. 华南

本世纪初就有人在长江流域四川、湖北等地寻找早期人类及其文化了。然而，截至四十年代，除云南等地有零星发现外，广大地区仍系一片空白。五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已经使情况大为改观。人类化石方面，除前面提到的元谋人外，属于直立人阶段的有安徽和县与巢县、湖北郧县与郧西县、贵州铜梓的材料；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有湖北长阳、广东马坝的材料；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有广西柳江、四川资阳、云南丽江和台湾左镇的材料，等等。文化遗物方面，除前面提到的元谋人石器外，按时代先后有观音洞（贵州）、梁山（陕西南部）、百色（广西）、大冶（湖北）、路南（云南）、铜梁（四川）、富林（四川）和猫猫洞（贵州）等地的材料。现将其中部分遗址简介如下：

观音洞遗址在贵州省黔西县。1964年冬发现，随后多次发掘。从洞穴堆积中发现石制品三千多件、哺乳动物化石二十多种，是目前华南一处材料比较丰富的旧石器初期遗址^⑧。这里的石制品以硅质灰岩岩块为主要原料；打片一般用锤击法，小部分石片与用碰砧法打下的石片特征相似；大部分石核不加修理，少数石核和石片的台面上有修理痕迹。石器比重大，占石制品总数60%以上。它们多用石片、碎片或石块加工，很少用砾石加工。石器形状不规则，大小悬殊，但以长宽在3—5厘米的最多。石器一般用石锤直接修整，刃缘陡直而不齐，单刃的少而复刃的多，复刃石器中异向加工的多。这些性状构成观音洞石器的特色。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占80%以上；其次是砍斫器和尖状器；此外还有少量石锥、雕刻器等。这种工具组合和北京人石器类似。尖状器中有些厚身的与华北的三棱大尖状器相近。总之，观音洞石器和华北旧石器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又有显著差别。

梁山遗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附近。1980年以来陆续在这里的汉江第三阶地砾石层和附近地面发现石制品，至今累计超过千件。已发表的报告认为遗址属中更新世晚期^⑨。石制品用石英、火成岩等大石片和砾石打制，尺寸较大。类型以砍斫器为主，其次是石球、大尖状器和手斧。刮削器很少。总的面貌和秦岭以北的蓝田、三门峡、丁村等地工业比较接近。与梁山类似的石器工业在汉江谷地分布较广，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发现的文化。目前，由于未发现共生的动物化石，遗址的时代一时难以确定。

百色文化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盆地，属于珠江水系的右江贯穿其间。自1973年以来，在这里的第三阶地砾石层和附近地面陆续采集了一千五百多件石制品^⑩。和梁山石器一样，百色石器尺寸很大，类型也以砍斫器为主而刮削器很少。不同的是梁山石球多手斧少，而百色手斧多但不见石球。另外，用砾石制作的石器多于石片制作的也是百色石器的一个特点。这个遗址的时代曾被订为晚更新世^⑪，但看来更可能是中更新世。

铜梁遗址在四川省铜梁县，1976年发现。石制品出自湖沼相粉砂层中，共生的动物化石有水牛、水鹿、中国犀、东方剑齿象等，时代为晚更新世， ^{14}C 测定为距今 $21,550 \pm 310$ 年^③。石制品三百余件，原料为石英岩、燧石等砾石。打片多用锤击法，偶用碰砧法。石器分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尺寸多在6厘米以上。它们多用石锤直接打击，刃口钝厚，刃角多在 80° 以上，异向加工的复刃工具很普遍。这些特点反映出铜梁石器和观音洞石器的密切关系。

富林遗址在四川省汉源县。1960年从这里高出河面20至25米的阶地堆积粉砂层中发现一批石制品^④，后来进行发掘，连前次共获石制品五千多件。化石很少，只有西藏黑熊和水鹿等。遗址的时代订为旧石器时代晚期^④。石器原料以燧石为主，用锤击、砸击两种方法打片，有修理台面的技术。石器分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三大类，还有少量雕刻器和砍斫器。富林石器尺寸很小，平均长、宽只有26.1和19.2毫米。从打制技术、石器类型来看，富林石器同北京人石器十分接近。

2. 东北

三十年代就有人在黑龙江省顾乡屯等地点做过调查发掘。但是，近三十年来才发现有确切地层根据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这些材料较多来自辽宁省，如本溪庙后山遗址、营口金牛山遗址、喀左鸽子洞遗址和海城小孤山遗址。另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也发现一些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如吉林安图的晚期智人牙齿化石、周家油坊旧石器晚期地点和黑龙江昂昂溪旧石器晚期地点等。

庙后山遗址于1978年发现，随后多次发掘，从洞穴堆积里获得一些人类化石、七十多件石制品和七十多种哺乳动物化石等材料。遗址含化石的堆积分上下两部分。下部代表中更新世中期和晚期，铀系法和古地磁测定为距今40万至14万年；上部代表晚更新世，铀系法和 ^{14}C 测定为距今10万至1.7万年。庙后山遗址是中国已知地理上最靠东北的一处旧石器时代初期遗址。这里的石器工业是一个同时兼有华北旧石器文化两大系统某些特点的地区性文化。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及其邻近地区远古文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⑤。

金牛山洞穴堆积从四十年代以来就以发现动物化石而引起学术界注意。七十年代在这里进行的几次发掘又获得大量动物化石、一些石制品和用火遗迹^⑥。1984年发掘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和一部分身体骨骼化石，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已发表的一些消息认为这些化石属于直立人，可与北京人对比。但是，在观察了标本之后，不难看出金牛山的化石明显地比北京人进步，而与早期智人阶段的大荔人接近。

小孤山遗址也是一处洞穴堆积，1981年发现，1983年正式发掘，出土了一些人类化石、上万件人工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根据动物化石，遗址属晚更新世^⑦。小孤山的石器工业，材料丰富，对于研究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无疑十分重要。但是，最惹人兴

趣的是人工制品中的骨器和装饰品。它们包括鱼叉、标枪头、骨针、穿孔兽牙、穿孔蚌壳等。其中，骨针、穿孔兽牙过去在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发现过，鱼叉、标枪头和穿孔蚌壳则是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首次发现。特别惹人兴趣的是，这些制品不但和欧洲的同类制品相似，而年代并不比欧洲的晚。

除了华南和东北以外，辽阔的大西北和青藏高原这块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空白地区，近年也陆续有了一些零星的发现，其中1982年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滨阶地砾石层中发现的石制品最重要。根据 ^{14}C 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它的出现表明在晚更新世气候条件较为有利的时期，今日不宜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同样有人类活动^⑧。

（五）对文化传统的探讨

对中国旧石器文化技术传统的探讨，是弄清其来龙去脉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过去，由于材料有限，进行这种探讨的条件还不成熟。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旧石器文化序列的逐步完善，这种探讨首先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华北开始了。

还在研究丁村石器时，就注意到它是华北黄土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与时代相当的萨拉乌苏石器属于“不同的‘相’，即有不同的技术和石器类型及特性。”^⑨随后，在研究匭河石器时，又提出它与稍晚的北京人石器“彼此间既有共同性，又有不同的特点，但不同性是主要的”，“这种文化关系上的密切和疏远的现象，除有时代上的关系外，同时也反映出：即或同一时期的文化，除存在着共同性之外，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上的不同特点。”^⑩但是，正式提出文化传统的理论是发现峙峪石器之后。这个遗址的报告是这样说的：“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其中之一是‘匭河—丁村系’，或称‘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富有代表性的石器是三棱大尖状器，在石器的成份中有时含有小石器，但数量有限，类型也很少。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石器地点有匭河、豫西三门峡地区、大同鹅毛口。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个系统是‘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简称第1地点—峙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细石器，在石器成份中细石器的比例大、类型多、加工痕迹细小。第1地点—峙峪系包括以下一些地点：周口店第1地点、周口店第15地点、朔县后圪塔峰、萨拉乌苏、峙峪、小南海等遗址。第1地点—峙峪系在更新世中期到更新世晚期这段时间是一个丰富多采的文化系统，在华北分布很广，它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⑪

关于两个系统，在后来的一些文献里有时也分别称为“大型石器”和“小型石器”系统。

现在看来，上述两个系统的分化可能在早更新世晚期就发生了。因为处于这个时期的小长梁、东谷坨石器已经具有明显的北京人石器先驱者的性质。到中更新世，这种分化愈加明显。到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类型多样化的趋势很盛，文化传统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以北京人石器为代表的小型石器保持强大影响外，又出现了一些和上述两大传统不大一样的文化。突出例子是水洞沟文化和下川文化。

水洞沟的石制品主要用硅质灰岩和石英岩砾石打制，分大型和小型两部分，前者为主。小型石器和北京人石器相似，但是构成这个工业主体的大型石器却具有浓郁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的风格。例如，水洞沟出土一些修理台面的圆盘状石核以及用从这种石核上打下来的三角形石片加工的尖状器和半月形刮削器，都是莫斯特文化流行的类型；水洞沟石器中比较普通的柱状石核以及用从这种石核生产的长石片加工的端刮器，与奥瑞纳文化的同类器物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早年的研究报告认为水洞沟石器工业“似乎处于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成长中的奥瑞纳文化之间，或者是两者的混合体。”^②在华北，和水洞沟文化类似的还有陕西长武的石器等。

下川遗址在山西省沁水县，1970年发现，1973年以来多次发掘。石制品出自山西省南部中条山主峰附近的一些山间盆地或周围山坡上的冲积、残坡积地层中，也有许多采自地面，没有动物化石共生。用地层中出土的炭屑进行¹⁴C测定，得出的结果多在距今23,000—16,000年之间。下川的石制品数量大，仅1973年发掘报告观察的标本就有一千八百多件。其中有少量粗大石器，但主体是丰富多采的典型细石器。它们包括锥状、楔状、船底形等间接打片的细石核以及从它们上面打下的细石叶；包括琢背小刀、角雕刻器、笛嘴状雕刻器、鸟喙状雕刻器、三棱小尖状器、两面打制的叶状尖状器、微型尖状器、箭头、钻具、端刮器等压制法加工的石器^③。比下川稍晚的含典型细石器工业还有山西省蒲县薛关、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等。

华北旧石器时代存在不同传统文化的事实已为多数研究者接受。但是，对于不同传统的分化起于何时、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目前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存在两种独立发展的文化，中国猿人石器能够反映华北和辽南同时代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技术，在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华北早期旧石器文化的一般性质，因之，我们建议，用中国猿人文化代表已知的这个时代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④当然，这种把北京人文化看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华北旧石器初期文化的主张会遇到许多实际困难。因为它是以不承认存在比北京人时代更早的文化为前提的。但是，作为科学研究的过程，不同意见的讨论、交流不仅是正常现象，而且对发展科学也是必要的。